

建党百年“一大”文献阶级话语再思考

孟 永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一百周年。建党百年之际，我们再来研读“一大”文献，体会其中的阶级话语及会议期间弥漫着的纯无产阶级精神，确实别有所感。今天，我们要谈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所形成的政治话语与政治文化，首先就要去理解其创建之初中国共产党人怎么就接受了这样一种迥异于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阶级话语和无产阶级政治文化，中共“一大”为什么弥漫着纯无产阶级的精神？这种纯无产阶级精神对于中共这个政治组织又有什么历史意义？

《史林》刊载了一篇文章《关于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兼谈中共“一大”纲领为何没能联系中国实际》。文章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中共早期历史而言，最关键的其实还不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中共‘列宁主义化’的问题。”^①确实如此。但副标题又提出中共“一大”文献为何没能联系中国实际这一问题，似乎这问题本身就有点问题了。

我们研究历史应该秉持一种理解而非批判的态度，应该进入“一大”之前中国现代知识人改造中国以救亡的精神世界里来内观时事，而不是站在“一大”这一历史事件之后或其结果的位置上来从外部评论。如果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一大”纲领为什么没能联系中国实际？那么，我们自然就会简单地评论说，“一大”不联系中国实际是因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所以脱离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了。这是一种后设视角。如果我们去考察“一大”为什么弥漫着纯无产阶级的精神，或许更有助于推进我们对于那段历史的理解。

就此展开，我主要谈三点：一是“一大”会议期间及文献中弥漫着的纯无产阶级精神；二是阶级话语和纯洁性诉求的关系；三是在这个层面上，“一大”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意义。

一

先说第一点。现存的“一大”文献主要有两件：一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译稿与英文译稿），一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俄文译稿与英文译稿）。这两份文件中的阶级话语以及与会者的回忆都说明：“一大”会议期间弥漫着致力于纯无产阶级运动的精神。纯无产阶级运动的精神就是指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并最终消灭阶级。例如，“一大”纲领就明确规定：“（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②后来，这类规定被我们称为党的最

^① 杨奎松：《关于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兼谈中共“一大”纲领为何没能联系中国实际》，《史林》2021年第1期。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高纲领，并简练表述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类纯无产阶级运动在当时被称作“社会革命”，以区别于仅仅致力于政权更替的“政治革命”。这里所说的“社会革命”，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观念中指的就是通过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李达在1920年年底就曾在《共产党》月刊上发文详细地阐述过这个问题。“社会革命地目的，在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他说，而要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概括地说起来，就是厉行非妥协的阶级斗争。”^①

而当秉持阶级话语、以阶级为本位，认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是历史使命的承担者之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表现出对于其他性质政治组织的排斥性态度，要“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②，要对现有其他政党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态度。在政治斗争中，“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③。因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的一切政党都是腐败的”^④，中国的一切政党都应该为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负责，任何使人民遭受这种苦难的党派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对于持续不断的内战，“不仅北京政府，而且南方政府也应对此负责”^⑤。由此，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他们对于国民党和孙中山的态度问题。

据周佛海回忆，在嘉兴南湖最后一天的会议上，与会者讨论是最激烈的。“因为张国焘等主张南北是一丘之貉，对于南北政府，应一律攻击。我与包惠僧主张应与广东政府合作。结果，他们的主张通过。”^⑥未曾发表的“一大”宣言草案还有“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的说法，^⑦但会议还是通过了。可见宣言以阶级话语所表达的排斥性色彩非常明显。最后只是考虑到宣言对孙中山的批评可能带来负面影响，陈独秀才决定不发表宣言。^⑧其实直到马林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时候，陈独秀等人也还没有改变对国民党的态度。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一个理由就是认为国民党“在广东以外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⑨。这也是当时中共对第一次国共党内合作这一方式如此排斥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我们仅仅从实践的层面来看这类充满战斗性色彩的条文及其背后的思想取向，也只能感叹其悬在半空，不切实际。就当时的社会实情来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并不发达，也谈不上是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一革命方案与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差距很大，对此，我们毋庸讳言。到了“二大”不就有了一个贴近实际的最低革命纲领吗？所以这样的一种改造中国的方案，如果我们仅仅从它是否联系中国实际的角度去解读，显然是缘木求鱼，走错了方向。但当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时就会发现，这种排斥性态度其实是怀着排斥中

① 江春：《社会革命底商榷》，《共产党》第2号，1920年12月7日。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8页。

④ 陈公博著、韦慕庭编：《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⑤ 陈公博著、韦慕庭编：《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100页。

⑥ 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汉》，《黄埔周刊》第8期，1927年7月2日。

⑦ 《李达自传（节录）》，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⑧ 可参据陈公博相关回忆。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古今》半月刊第35期，1943年11月16日。

⑨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1页。

国现状的心态来改造中国现状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情绪的另类表达，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当时黑暗腐朽的现实社会而提出的对于共产党组织纯洁性诉求的一种表现。阶级话语及其承载的无产阶级精神适应了这种心理需求。

在外面来看，纯无产阶级运动的精神表现为对其他政治组织的排斥性态度；在内部来看，纯无产阶级运动的精神则表现为对党员资格的严格要求。首先是入党资格要求严格，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党员在入党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①。其次是不允许做官。党纲第十四条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②为什么要对党员作如此严格的要求呢？因为他们认为，在一个污浊的社会里，中共党员如果参与其他党派或做官，共产党员的人格就会被败坏，就不容易保持自己的纯洁性。据张国焘记述，1920年7月底他与陈独秀谈起党员资格问题时，两人就大体是主张宁缺毋滥，都不愿意政治背景复杂或人格有缺陷的人入党。他们认为，“共产党是圣洁的，要求每一个参加者也必须是纯洁的人物”^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成立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抛弃在黑暗社会及腐败团体之外创造新社会的理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话语及其所体现的纯无产阶级运动的精神，展现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针对黑暗现实所提出的对于共产党这个新型政治组织近乎苛刻的纯洁性诉求。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把这种阶级话语及其所承载的纯无产阶级精神作为当时中国知识人对纯洁性诉求的一种积极呈现，这种纯洁性诉求实际上是中共建立之初接受阶级话语及无产阶级精神的心理基础。这是第一点。

二

我要谈的第二点是：纯洁性诉求在当时有志于改造中国的知识人群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思想现象；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思想是中国知识人探索救亡道路的自主行为，阶级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自身发展的独立要求。

中共“一大”召开前，列宁等人就对东方落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问题予以关注，并在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上规定了共产主义者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然而，我们发现：尽管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了会议，中共“一大”并没有接受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大会反而贯穿着纯无产阶级运动的精神；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思考的重心并不在于如何将新型革命方案具体落实于中国的实际问题，实际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如何建设一个新型政党组织上面。

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几乎是将源自西方社会的阶级话语及其所承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完全移植过来，但如果将这一现象视为共产国际“输出革命”的结果则是一种误解。后来，反而是共产国际通过劝说甚至下达命令的方式，才使得国共党内合作得以实现。1922年3月底至4月初，马林向中共领导人提议中共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时，几乎遭到党内一致的反对。陈独秀态度坚决地致信维经斯基，请他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共反对加入国民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5页。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96页。

党的数条意见，而马林则被迫离开上海回共产国际报告工作。这一系列事实不正说明“一大”会议精神不联系中国实际而专注于纯无产阶级运动，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自主行为，而非外来输入的结果吗？

“一大”所体现出的这种纯无产阶级精神，是中国现代知识人激进心态之下纯洁性诉求的一种外在表现。他们鄙视现实政治，对中国实际抱有一种疏离感，执着于在中国现实社会之外寻求解决方案。就像张国焘所说：“我的同志们多数是初出茅芦[庐]的书生，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他们瞧不起现实政治，甚至认为不够清洁或者充满罪恶，也不喜欢纪律、训练、严密组织、思想行动一致这类的东西。”^①可以说，纯洁性诉求是当时中国青年思想界的普遍现象，中共对纯洁性的苛求乃是当时知识人改造中国方案的逻辑演进，是中国政治大环境不断恶化的应对产物。

当时的有志青年大多数不愿意以纯洁之身卷入政治潮流，而是在现实社会之外组织纯洁性的小团体以改造中国。当时致力于改造社会的众多社会或政治团体，其实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诉求。少年中国学会在讨论“小组织”问题时，宗白华提出要“跳出这腐败的旧社会以外，创造个完满良善的新社会。然后再用这新社会的精神与能力，来改造旧社会”^②。称现实社会为“鬼间”而非“人间”的王光祈则对此充满期待：“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③1921年，在南京的年会上，邵爽秋认为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源于：“一般有志向上的青年，愤于现今社会之黑暗，乃欲作一有组织的结合，以创造少年中国。”^④而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大家以纯洁的团体相标榜，但实际上又不能个个做到十分纯洁。这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少年中国学会如此，新村实践与工读互助团也是如此。作为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尝试，这类团体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避开社会现实，在现实社会之外另外建立一个新型团体。新村实践是通过购买一小块土地，聚集一批志同道合者，实现泛劳动主义的新生活。他们的目的也是要达致大同社会，实现人类本位这样一种理想状态，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等级之分。^⑤就理想而言，工读互助团与此相似。工读互助就是在城市中本着人类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王光祈将它看作“新社会的胎儿”，认为必先养成一种互助劳动的习惯，才能实现心中的新社会。^⑥立足于互助思想，致力于和平改造社会的一种方式，我们不难看出，新村主义的前提假设是道德理想主义，是通过个人道德完善及对他人的道德感化来改造社会，也就是说首先是对个人的纯洁性诉求。

之所如此苛求纯洁性，在现实社会之外另建新团体，正如时人王统照所言，都是因为社会太污浊所致。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社会充满了虚伪和污秽。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这类团体创建的初衷就是要以纯洁对抗污浊，以光明对抗黑暗，以新团体对抗旧社会。正是当时政治实况的恶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14页。

② 宗之樾：《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

③ 《讨论小组织问题》，《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

④ 《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⑤ 参见周作人：《日本的新村》，《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15日。

⑥ 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15日。

浊所导致的失望情绪及由此而产生的烦闷感、幻灭感，使得知识人在某种程度上转而向内求，高度关注和追求个人心灵的纯洁和精神的无瑕。这成为当时有志于救国之青年知识人较为普遍的一种心态。

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留下来的资料是比较丰富的，现在读起来，字里行间弥漫的改造热情还是很让人感动的。我们现代中国的进步主要就是靠这类满怀激情和梦想的年轻人推动前进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一批满怀激情和梦想的年轻人，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大背景中成立的，也是这一种普遍性心态的组织呈现。从这一点来看中共“一大”的阶级话语，我们不难发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阶级本位、组织强化的方式将其纯洁性诉求纳入对党员群体的基本要求之中，内化到其精神气质之内。而恰恰是在这种理想主义的激励之下，中共组织充满勃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当时中国一股重要的新生力量。1925年，戴季陶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离粤去沪后，于12月12日致信蒋介石说：“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而国民党旧同志之腐败退婴，已无可讳。”^①徐复观也曾充满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的良心血性之士，多半在共产党内……他们的作法我不赞成，但他们是理想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以致在这种理想和爱国精神下的牺牲奋斗精神，我内心很佩服。”^②

这种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这种勇敢无畏的牺牲精神，这种弥漫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团体中致力于纯洁化的精神气质，使得这一群体迥异于当时其他政治团体，成为中华民族走出苦难深渊的希望之光。正是这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与救亡方案的一次次失败所催生的、近乎苛刻的纯洁性诉求推动了阶级意识的诞生。建立一个傲立于现实社会之中的纯洁性组织，用激烈方法谋根本改造，这是致力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本义。但建党之初，因怀有排斥黑暗现状、担心人格被败坏的心态，思虑重心还不在于联系中国实际。“一大”对中共的意义也不在此。

三

那么，“一大”对于中共意义何在？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三点，就是“一大”对于中共自身的意义。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意义和史实是不一样的。上面谈的是回到历史场景中来理解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阶级话语这一史实，需要进入历史事件发生之际的场景；现在要谈这一历史事件对于中共自身的影响，则需要从历史事件之后的发展情况来看了。

事件的历史意义是后来赋予的，而非即时产生的。当一个事件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历史事件时，它结束了，它的历史也就结束了，一般不会产生历史意义。而当这一事件成为一个更大的历史事件的组成部分时，则会因为它在这一更大的整体性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并且其意义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可以说，正是后来发生之事反过来影响着以前发生之事。因而，一个事件是否具有历史意义及其意义之大小，一般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事件本身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其对时人与时事的影响力之大小往往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二是这一事件与其他若干历史事件相关联，处在一个更大的整体性历史事件中，并构成其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体性事件不但未完结，反而不断延伸与扩大，这一历史事件也就会

^① 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册，“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版，第399页。

^② 转引自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268页。

被赋予更加重要的历史意义。

作为一次开端性事件，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这样一个政治事件。“一大”的历史意义将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正如杨奎松教授所言，若从中共建党开始就谈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合实际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其实就是怀着一种排斥现时中国的心态，要将迥异于中国的改造方案移植于中国以救亡。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心态趋向的角度，我们似乎也不能将“一大”没能联系中国实际的阶级话语作为“教条”来理解，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关系远近来理解“一大”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

其实，整个近现代中国救亡史，仁人志士首先考虑的是救亡方案的速效性，而非符合国情。因为当时的中国是被改造的对象，联系现实也是为了改造现实。只有在救亡方案实践过程中，才会逐步考虑此方案是否适合中国实际这一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改造方案层面而言，恰恰不是某种救亡思想的中国化，而是非中国化（否定现实的中国，憧憬理想的中国）；而就改造实践层面而言时，才会涉及某种思想的中国化。因为不对之中国化，就无法予以付诸实践。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因而，所谓适合还是脱离中国实际是一个实践层面的问题，而非在移植西方救亡方案时所首先考虑的理论方面的问题。这和对于理论本身的熟悉程度也无太大关系。越是不熟悉才越是能够在实践层面上去改变它，使之适应实际需要，过于熟悉反而会成为行动的障碍。也就是说：在理论层面上，任何方案都是外来的而非本土的；而在实践层面上，才会面临一个如何使之联系中国实际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学”和“术”的关系问题。“学”就是探索未知的事物，“术”就是将探索所得应用于实践。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主要处于“学”的层面。

所以当我们说，这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一大”纲领严重脱离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时，我们其实也就脱离了中共诞生之际的历史实际。如果说“一大”纲领受共产国际二大相关决议影响很大，是针对社会民主党的一种言说和表态，那为何在建党原则上贯彻列宁主义原则，而又不遵循甚至反对其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联合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呢？在某种意义上说，“一大”创建之功在于奠定理想，而不在于付诸实践，“一大”的意义不在于联系实际。

关于“一大”的历史意义，官方党史论述主要是着眼于宣告了一个新型政党的诞生，以及中共诞生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那么如何看待“一大”对于中共的历史意义呢？除了在组织形态上正式形成了中共的中央机构（中央局）、进一步完善组织架构以外，其最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精神层面。这个不联系实际的、充满纯无产阶级精神的“一大”纲领和决议，奠定了中共这个新型政治组织整体性的精神气质。“一大”纲领和决议对党员心灵和精神纯洁性的诉求，构成了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结构的核心，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基调。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其理想化的精神气质、纯洁化的心灵诉求、果敢无畏的行动意志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精神气质中最核心、最鲜明、最稳定的部分。中共“一大”的意义在于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开辟了一个非时间性的、永恒的精神领域。作为开端，中共“一大”不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开始，而是一个“第一原理”；中共“一大”不再仅仅是一个年代概念，而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意识中一个永恒的、不朽的元素，一个精神的原点。

如果说中共“一大”文献着眼于理想层面，是为最高纲领。那么，中共“二大”文献则着眼于现实层面，是为最低纲领。前者构成恒定的圆心，后者则随着现实任务的变化而形成各种联系

实际的圆环。前者为后者提供永恒的精神支柱，后者为前者提供活动的历史舞台，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由此而统一。如此，“一大”所彰显的革命理想主义与“二大”所体现的政治现实主义，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这一新型政治组织的精神世界和结构特征。

纵观百年历程，以阶级为本位的精神恰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强度，使其更有凝聚力、更有坚韧性、更有战斗力。中共在百年发展历程之中，不断加强党性锻炼，不断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如此种种，如何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造现实中国的实践中一次次向精神原点的复归呢？

最后，我想将上面谈的三点做一个概括性的总结，也是我这次所谈内容的三个主要观点。

第一，基于污浊社会而产生的纯洁性诉求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接受无产阶级意识及其话语的心理基础。

第二，无产阶级意识及其话语虽是直接移植自西方思想，虽是西式话语，却是中国心态，这一需求本身正是中国现代革命历史自身发展的结果，阶级话语的意识深处涌动的仍是民族情感的波澜。

第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阶级本位、组织强化的方式将其纯洁性诉求纳入党员群体的精神世界之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中共也正由此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无比顽强的意志以阶级革命的方式实现了民族革命的目标，并继续向社会革命迈进。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